

中国满族文学史编委会学术年会（材料之十七）

# 满 洲 文 学

鸳 渊 一 著  
高 木 东 译

中国满族文学史编委会编印

1980.11.15.

中国满族文学史编委会学术年会（材料之十七）

# 满 洲 文 学

鸳 洲 一 著  
高 木 东 译

中国满族文学史编委会编印

1 9 8 0 . 1 1 . 1 5 .

# 满洲文学

鸳渊一 著

高木东 译

## 序 言

满洲文学，从狭窄的范围看，首先涉及语言问题，从广泛的范围看，要涉及整个满洲文化，如前所述，满洲人早在乾隆末期已经忘掉了国语，当政者几经努力也无济于事。他们编纂了《清文鉴》等书，以鼓吹民族语言的保存和普及，然而这只是展示一下忘却了的语言的残骸而已，而所刊行的书大部分是中国书的翻译，而且又是满汉合璧，不过他们的思想多为中国人思想的抄袭，这也是很自然的。满洲族从空无所有的荒野走向有高度文化的中国，采用几许中国文化以至于被同化，这也是自然趋势，他们本来是一无所有的统治者，如果统治文化人势必要遵循中国的政令。这一点，通常可以看到通古斯族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就和蒙古族不同。蒙古族除了武力之外，不承认任何别的东西，后来为了统治中国人，于是在某种程度上采用了中国文化，但他们的蒙古至上主义，始终未变。

反之，通古斯族如古代的渤海，金、则轻易地被中国同化了，也可以说这个民族富于融通性，如果满族始终保持自己原有的故态，君临中国而欲统治文化人，自己这点开化程度远不够用的，所以终于不得不依靠中国的政令、文化。

满洲文的书几乎全部是中国书的译本，虽然意在莫忘国语，而所学者却是中国思想、中国文学、中国生活方式，而今日欲加制止，就更行不通，如果禁止搞学问，搞文学，只想读纯粹的满洲文、结局只意味着自身的衰退和灭亡。所以通过这些书掌握满洲语虽然有效，但却逐渐被中国文化，政教，文学在精神上同化了。我们感到遗憾，不满足，但这也无可奈何，劳法博士说过：

“被高度的文化所同化了这是不可壁免的趋势。而他们又没有把自己民族文学的古代作品流传于后世。他们或许认为这种努力没有价值，所以自己什么也没留下，终于被中国文化无条件地同化了，所有家庭谣曲都放弃了，在满洲语的书籍中一点俗谣、英雄史诗、古代故事、宗教歌谣，也没留下。在乌拉尔阿尔泰民族历史上恐怕是独一无二了。绝对只能认为他们在接触中国文化以前一无所有，因为他们的近族赫哲族迄今仍然留下了不少神话传说，而他们在新的观念袭击下，给他们以强烈的冲击，结果古代的东西悉被破坏，在占领中国后，汲汲于新文化的吸收，而无暇考虑他们古代的文化及其民族生活，满洲人的性格屈服于中国精神，而满洲

人变成中国人。”

上述论点未免稍有夸张，他们因有文化并未完全丧失。有传说、故事、也有萨满教故事，不过这也是支流，其主流应如下所述。

为什么他们没有把原始文学，即文化流传下来？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自始他们没有记录的文学工具，虽然后来用了蒙古字，他们用来记录当代的事，而顾不得记述这些古代的事，后来太祖虽然创制了满族文字，情况没有变化，恐怕长年致力于战争，政治，无暇顾及内部这精神上的事物，这倒不是说他们的创造力一定低下。达海虽然专门从事翻译，也很有可能涉及足于表现民族学，假使天假以长寿，总会留下一些东西来的，他既能把太祖太宗的满文古事录留给后世，那末如果稍有余裕，而且指导得当，总会给后世留下一些东西，他们忘了本，很快中国化了，以后使用满语也是形势所迫，为了当官，不得不学，八旗子弟早就衰萎无力，满洲精神衰萎了，原来就贫弱的满洲文化也衰萎了，由此可见，文学也就没有什么发芽滋生的可能了。

## 满洲文学的价值

当前，我们研究满洲文学的主流，不过是靠中国的翻译文学，那么，我们在翻译文学中能够提供那些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主要要朝着什么方向活动？首先芳法博士将梅林多尔

夫列举的249种作品整出来后，认为确实的作品有168种，其中加上梅林多尔夫遗忘的180种，构成了满洲语的资料并予以正确的评价。因此，在今西博士的报告中，认为中国的译本已达千种左右，此外，故渡部熏太郎推测有三百余种，其中128种附有注释。这些数字固然一时难以确定，但也并非特殊问题。问题关键在于这些翻释文学具有那些价值，它将朝着什么方向活动。

西洋学者确信他们翻释的大部分准确无误，又多杰作，并且在译文中附加中国史和法律方面的注释。它不仅阐明了事件的真相，而且在语言方面也有解释，使原文更加易懂，对学中国语言，中国文学研究人员帮助很大，这是西洋学派的说法。可是中日文学研究家对此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在满洲语汇贫乏的条件下，如此高度评价诚属疑问，应在某种程度上适可而止。可是，身为统治者的满洲人，他们重视其文学成就，无论在外表上或内容上都使之占据优越地位，这已成无可争议的事实，他们为了向外国人推崇炫耀，进行了数国语言的对译，其译本在文化事业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不能认为这仅限于中国语的成就，在其他方面也应予以一定的评价。

顺便说一下，满洲文学是以年代划分的；第一期为摇篮时代（太祖、太宗时代约46年），第二期为青年时代（世祖时代约18年），第三期壮年时代（圣祖、世宗时代约74年），

第四期老成时代（高崇时代约60年以后）嗣后为了叙述简便并不以时代划分，主要按其内容进行分类。

## 满洲文学的分类·形态

历史文学 辽金元三史由达海等人开始译成满文，顺治初年全部完成并刊行问世，成为历史文学的先驱，他们已经征服蒙古统治中国，元明两个朝代的创世者的教训及其发展历史引起了浓厚兴趣，追塑往事，雄兵北进的辽金王朝做为自己亲族中不容忽视的历史，是理所当然先译，然后，译出《通鉴纲目》（康熙30年）。这是对中国历史产生兴趣的结果，并且使执政者以此为鉴。除此以外，还把《蒙古源流》译为满文，进而成汉文，对于外国历史仅限于这种程度。对本国历史，歌颂其祖先的英勇功绩，以期垂范子孙，为此，他们在建国伊始即着手编纂历史所谓满文老档，为日录体就具有上述意义。编写实录三体显示出惊人的才能。尤以其者既为历史和历史资料，同时也是探讨朴素社会状态的极好资料。由此可见，文具有与元朝秘史相似的价值。后来，国史馆开始编纂国史，著有《八旗通志》，《民族通谱》或《王公表传》许多史书以及《开国方略》，《平定三逆方略》各种方略的满汉两种文学的作品。此外乾隆31年又写出了《西域同文志》地理辞典，这些足以说明他们的企图。重视其历史的同时，自然对于兵书也会发生兴趣，太祖熟悉兵法，达海

曾经翻译六韬三略是确有其事。康熙49年，出现《孙子》《吴子》的满文译本，成为当时战争上必读书籍。由此可见，他们对一种战争文学的向往情况。

立法法典圣训。继明朝之后，满族为自己国民及所辖地区人民编纂法典。他们并不破坏所辖地区在立法上的原有习惯，援用前代中国人的规范同时采用新的方式，以确保不同民族的同棲关系。这一问题意义深远，在征服地区，维护国家政权威信，若单纯以武力为后盾或仅以法制进行惩罚，均无成效。满族的政治权力必须贯以中国人的伦理观，始可研究建设理想国家的问题。并且从这一观点出发，下列儒教书籍的翻释工作已提到重要日程上来了。

属于这类翻译工作，首先是大明会典的译本，此书的译本是达海在临死之前（元聪6年）完成的，清朝在明朝典例中求教于典范，于是顺治年大清律例出自他们之手。康熙33年编出钦定大清会典，完全效仿上述作法，并用满汉两种文字写成。按此做法陆续编出各方面的通例规章。随之乾隆54年经首次公刊，嘉庆22年完成了钦定理藩院则例。至此，清朝如何施行对异民族的统治政策，叙述详细，令人深感兴趣。值得注意的是立法法典在翻译或自编的同时，早于顺治3年已译出明太祖洪武帝的圣训，这是与明会典的翻译相辅相成。后来，清朝历代天子的圣训也都效仿这种作法，编纂满汉文字了。皇帝的圣训也都重视立法行政，努力施行理想的

统治，以期国民同乐，大清帝国，永世繁荣。同时，道光年间颁布八旗和吏治辑要，训诫以国家为中心组成的八旗人做为施政时勉励官吏，振肃纲纪的大法，足以说明皇帝如何重视政治上实际运用了。

伦理道德——儒教。这与上述问题有关，为了满族人的需要当然要从中国语翻译出来，对于不具备任何日常道德观念的满族来说，毫无疑问必须依赖具有现实主义的中国道德哲学书籍和孔子的说教。所以对他们显示出高度的适应性，为此，上述诏勅圣训也被译出，并且统治者和官吏为追随幸福生活，勉励国民的道德伦理，以及美妙的格言集均被译出。这些翻译文学的问世，毫无疑问，是给予他们很大的恩惠。

首先，中国古典的译本，与四书有关的有康熙年译出的《日讲四书》以下多种，与五经有关的早于顺治11年译出的《日讲诗经》以下诗、书、易、春秋、礼记的日讲或冠以御制的许多译本。还有《孝经》《大学衍义》《小学》等译本。还译有《朱子节要》《性理指义》也有《清文古文渊鉴》翻译古文等著作。王应麟的《三字经》和《先人的文集》，《名贤集》，《醒世警言》等译本。这些书籍被理解到什么程度，对满族人帮助多大，当然无法用尺度测量，但给予极大的影响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顺治12年颁布的《御制劝善要言》和康熙皇帝的训言作为《圣谕广刊》已由雍正皇帝刊行，所有这些都是与过去圣训同为伦理道德的准绳。

这些中国古典道德书籍之被译出，并为朝廷和知识界所阅读，不久则成为教化满族人日常行动以至政治上施政的基础。有关礼仪满族人本身的书《大清通礼》，《满洲祭天典礼》也是由于重视祭天礼仪的民族风尚进行编写的，同时根据中国道德规范也很重要。

宗教文学 满族固有的宗教信仰与北狄一样为黄教。当然，从高句丽，渤海时代传来佛教普及满洲各地，清朝的满族也一定熟悉佛教。其祖先明代女真人多以有关佛教的名称命名，说明已深知佛教，并有产生一定程度的信仰，而且通常与其它宗教平等对待，并有同样的兴趣，这种情况与蒙古族相似。所以他们不信仰道教，也不信仰关帝，后来在对蒙古人的政策影响下信仰喇嘛教，康熙、乾隆二帝虽然信仰耶苏教和喇嘛教，这是他们自己的信念，满族未必全都信仰。所以，只要他们对其它宗教同样发生兴趣，决不能认为根据一种信仰即可对满族进行宗教教育。因此，所谓宗教文学也不是突然产生的，唯有对佛教和道教发生兴趣，翻译他们的某种经典，由此涵养一些情操，进行精神修养。

那末，需要翻译什么经典。首先从佛教来看，最初着手的是达海关于大乘经的翻译。这一工作虽然没有完成，后来遵照乾隆皇帝的敕命，满汉蒙番四体合璧大藏金咒在38年刻印，后至55年大藏经全部译完，今日珍藏于承德的满文丹珠尔（经部）实为伟大的遗产，丹珠尔（续部）的翻译虽然未能实

现，但其目录已被译出，这是一部庞大的译本，在实际上具有多少阅读价值尚属疑问，不过乾隆皇帝尽管做过些努力，真正的佛教在满族之间未能推广一事已可证实。然而，这从中国正个社会来看，清朝时代佛教一般来说并不盛行，因此，始终不会想到满族打算使佛教传播起来。

其次从道教来看，这是他们一开始就怀疑的没有进行翻译，渐至康熙12年，才开始译有《感应篇》，后来，乾隆年又译有《太上感应篇》，此外可能还有译本，这也和佛典一样，一般满族能读多少尚属疑问。

此外还有基督教经典的译本，如《新约全书》于道光15年业已刊行，《旧约全书》也被译出。除此之外，《万物真原》、《教要序论》、《天主实义》这种类书虽被译出，最初清朝由于禁止基督教以至未能推广。如上所述，其它国家的宗教书籍的译本虽然为数很多，但决不致达到以此教化满族人，发展宗教文学的程度。与此相反，发展兴趣的还是固有的信仰。现在满洲北部关于女黄教僧尼孃的手抄诗歌故事，仍有传说，据说这里有该教的宗教根据，特别是仪式写得十分清楚，其它有占卜书，戒律书等黄教的书籍。此外，为了执行黄教庙的祭典，乾隆30年制订《钦定清文祭祀条例》。满汉文的《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编纂恰如因有的信仰那样根深蒂固，这些书不单纯是宗教，而是通过这些可以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认为非常有趣。

美文学·小说 如上所述，满族人生长在满洲荒野之中，他们一旦接触中国文化，很快就被同化了。他们越接近，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越感到迷惑。其结果，对于富有魅力的中国美文学作品即小说，戏曲类发生兴趣，成为家庭的读物，这一现象不容忽视。这类书籍的译本与上述翻译过许多书有所不同，更接近满洲语的口语体，叙述方式文字流畅，而且通俗易懂，这一特点使新译本全部表现得生动活泼。早在1680年（顺治7年）《三国志》的翻译工作已由政府着手进行，继而人情小说，历史小说也被译出。康熙48年《金瓶梅》，同50年《西厢记》，乾隆18年的《小浒传》，道光末年的《聊斋志异》都是他们喜爱的读物。特别是《金瓶梅》以中国文为兰本仅以满文出版，只在人名地名以及满族人难解的几个地方用中国语注释，满洲版将其全部带有独特兴趣的以此为兰本。不过这种人情小说，在满族人的生活习惯上是突出写实的。由于有伤风化和政府惟恐产生不良影响，没有准许出版发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于文学业已发生兴趣，而所有这些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都很贫乏，只好为中国的沈溺生活所诱惑。向来单纯的思想容易为外界事物所感化和诱惑，满族可能成为这类典型。况且人们厌倦道德约束，而不道德的内容却为一般人所接受其强烈的引诱力，由此可见，小说类被视为最好的书，这是容易理解的。

诗 满族对诗可能也相当敏感，现在北满仍残留着民

间诗集，特别是历代宫廷人物爱好中国诗，并且用本国语言作诗，康熙、乾隆二帝擅长汉诗，并著有满洲语的诗赋。康熙52年的《御制避暑山庄》是夏季在热河离宫所赋的诗。乾隆13年的《御制盛京赋》是祝福旧都盛京（奉天）的赋。这两首诗、赋，都是与汉文合璧，但乾隆皇帝写《盛京赋》之时，命令当时学者效仿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古风的满洲字，后来通过学者之手，创造32体的满洲古体字，所以《盛京赋》是用与32体的满洲字相同的32体的古体字印刷的（后来将2体合并为64体）上述古体文字为篆字，满洲字可能是以蒙古的古体字为基础，太宗皇帝的玉玺是效仿满洲篆字的。其结果规定以后皇帝玉玺，内阁大臣，高级官吏的官印以及任免令均使用满洲篆字。这固然暴露了乾隆皇帝的统一野心和夸张的性格，仅以单纯的装饰而已，但对他们文学来说，也应该为这是具有一种艺术品的价值。

辞典·语学书类      以上附带介绍了通过中国书籍的翻译，满洲文学的概况，包括满族自己的几部作品。其它天文、数学、医术也有译本，他们译成满洲语可能范围很广，而且种类是繁多，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大体上可以限于以上六种分类。

最后为了学习理解满洲语，为了宣传满语，皇帝、政治家或学者努力写作，在某种意义上，满族自己的文学——就此再进一言。这些文学作品大体上可以分为读本，文法，拼音

字典，辞典等许多书籍。例如第一类读本有《清文启蒙》，《清话百条》，《清文指要》，《满汉成语对照》，《三合语录》等，第二类为文法和拼音字典有《钦定满汉成语对音字式》，《清文接字》，《清文虚字指南篇》，《音韵逢源》等或满洲语学习书，入门书都有很大作用。在其认真编写的图书中无论在历史方面或语言方面，我们认为最有价值的还是第三类辞典（广义的）书，这些种类繁多，但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1）勅撰的——我们最重视的是康熙、乾隆二帝撰写的五种清文鉴，最初，康熙皇帝于康熙47年著有《御纂清文鉴》规定了满洲语汉译的标准。乾隆皇帝对此书补充新满洲语将旧满洲语的译文予以订正。于乾隆36年将《御制增订清文鉴》出版发行，然后翌年他又将《增订清文鉴》的满洲语本译成蒙古语以满蒙汉三种文字印发《御制满蒙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后又加添西藏语，作为《御制四体清文鉴》出版发行，最后恢复新疆加进回语，完成了《御制五体清文鉴》。这些只作为显示清国国土扩张的光辉成就。在其领域内语言辞典的杰作意味着一种创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些语汇因然是字出自满洲，而新从中国语创作出来的，并且译文也有不少疑问之处，然而，动员当时学者集体编纂，译文有所依据，基本可靠。

（2）私撰的——数量较多，现在将其主要的以著作年

代顺序列举，大体上有以下几种，即《大清全书》（康熙22年），《广记全书》（康熙42年）《音汉清文鉴》（雍正13年）《一学三贯清文鉴》（乾隆11年），《清文汇书》、（乾隆16年）《三合便览》（乾隆45年）《清文补记》、（嘉庆7年）《清汉元音字典》（同治13年）《清文总汇》（光绪13年）等，这些书籍现在作为满洲语的辞典，对科学研究也很有帮助，其中最后创举的《清文总汇》、《清文汇书》和《清文补汇》为混和排列的，所以新的满洲语也可提到线索，这种辞典非常方便，当然这些书籍是以汉译为主，部分加进蒙古语，面临中国人的文明重要问题，对当时清朝满族来说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此外对此辞典附带说明的是西洋人编写的满洲语辞典的情况，现在一般常用的有扎哈洛夫的《满俄辞典》这本辞典，是以《清文汇书》为兰本，参照其他书籍编译而成，准确可用。其它还有阿米欧的《满德辞典》和佳比林兹的《满德辞典》，其内容与前者相距甚远。

上述各书为满族的独创作品——至少不是中国书的译本，而是在满洲的以满语为中心翻译别国的方针下，独具浓厚的满洲中心彩色——对此业已阐明。但尽管他们的执政者和学者致力于满洲语的保存和普及并达到如此程度，但满族人已把它完全忘掉了，现在书籍作为过去历史的遗产而徒具残骸，吾人深引为憾。无论主流是中国书的翻译文学也好，

《满洲文学》仍然有独立性，认真研究起来，应该认为还有许多价值。不过。满族的中国化进行得非常迅速，以致他们忘掉了满洲语，放弃满族精神，并以当个中国人为自豪。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寻求满洲文学，树立满洲风尚，实属强人所难，不易兑现。因此，独特的满洲文学不容易再次出现，翻译的满洲文学也难结成丰硕果实。毫无疑问，上述各种作品，现在只能视为历史遗物，这种意义上，这些遗物现在得以展示出来，许多问题都给我们带来很大兴趣。（鸳渊一）

摘译《东方学》第六辑

东方学会一九五三年



《满洲文学》仍然有独立性，认真研究起来，  
许多价值。不过。满族的中国化进行得非常迅速，以致他们  
忘掉了满洲语，放弃满族精神，并以当个中国人为自豪。在  
这种情况下，如何寻求满洲文学，树立满洲风尚，实属强人  
所难，不易兑现。因此，独特的满洲文学不容易再次出现，  
翻译的满洲文学也难结成丰硕果实。毫无疑问，上述各种作  
品，现在只能视为历史遗物，这种意义上，这些遗物现在得  
以展示出来，许多问题都给我们带来很大兴趣。（鸳渊一）

摘译《东方学》第六辑

东方学会一九五三年